

肆

最新修订精装典藏版

序
新文出版社

胡適文存



一代大师 中国新文化的先知楷模 尽显文人大家 儒雅风范

胡適文存



肆

華文出版社
HUA WEN CHU BAN SH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文存·4 / 胡适著. --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075-3972-1

I. ①胡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胡适(1891~1962) — 文集
IV. ①C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0779号

胡适文存 肆

著者 胡适

责任编辑 黄鲁 吴晶

策划 郑雅玲

封面设计 视觉共振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

邮政编码 100055

网址 <http://www.hwcbs.com.cn>

电话 总编室: 010-58336255 发行部: 010-58336270
责任编辑: 010-58336193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 15.25

字数 420千字

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

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075-3972-1

定价 39.8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自序

这里收集的一些文字大都是最近五年内随时写的，其中偶有三四篇是五年前写的。这些文字差不多全是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过的。没有发表过的只有这几篇：

《〈四十二章经〉考》和附录三件

《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》

《论〈春秋〉——答钱玄同》

《论〈诗经〉——答刘大白》

《明成祖御制〈佛曲〉残本跋》

《〈参同契〉的年代》

这一集本是《胡适文存》第四集的一部分。因为有许多讨论政治的文字——尤其是我这三四年来看讨论国际政治的文字，——在这个时候不便收集印行，所以我把其中关于学术思想的一部分抽出来，编成这一集《论学近著》。

这一集分五卷。第一卷只有三篇文字：《说儒》一篇提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新鲜的看法，我自信这个看法，将来大概可以渐渐得着史学家的承认，虽然眼前还有不少怀疑的评论。此外两篇都是讨论治学

方法的：《老子》年代一篇是考证学的方法论；校勘学一篇是校勘学的方法论。

第二卷全是整理佛教史料的文字。只有《真诰考》一篇是关于道教史料的，因为《真诰》牵涉到《四十二章经》，所以我把这一篇也收在这里，第三卷全是整理小说史料的文字。《西游记》的第八十一难》是一篇游戏之作，收在第三卷里作个附录。

第四卷是我近年对于国内几个重要的思想问题发表的文字。青年的读者若嫌这一集的考据文字太沉闷了，他们最好是先读这一卷。这一卷的文字最容易读，并且这里提出的一些思想问题，也都是值得大家平心静气的想想的。

第五卷是一些杂文，只可算是全集的一个附录。

五年之中，只有这一点讲学成绩，我自己很感觉惭愧。如果这几十篇文字可以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批评，那是我最欢迎的。

二十四，十，廿九日。

目录

卷一

说儒 / 003

附录一 周东封与殷遗民（傅斯年）/ 064

附录二 毛西河论三年之丧为殷制 / 071

附录三 三年丧服的逐渐推行 / 075

评论近人考据《老子》年代的方法 / 082

附录一 与钱穆先生论《老子》问题书
(胡适) / 100

附录二 致冯友兰书 (胡适) / 102

校勘学方法论 / 106

序陈垣先生的《元典章校补释例》* / 105

卷二

论《牟子理惑论》(寄周叔迦先生) / 117

陶弘景的《真诰》考 / 120

《四十二章经》考 / 137

附录一 寄陈援庵先生书 (胡适) / 144

附录二 答陈援庵先生书 (胡适) / 145

楞伽宗考 / 148

《楞伽师资记》序 / 181

荷泽大师神会传 / 187

《神会和尚遗集》序 / 218

《坛经》考之一 (跋《曹溪大师别传》) / 220

《坛经》考之二 (记北宋本的六祖《坛经》) / 228

卷三

- 辨伪举例（蒲松龄的生年考） / 241
 《醒世姻缘传》考证 / 248
 附录一 柳泉蒲先生墓表（张元） / 290
 附录二 跋张元的《柳泉蒲先生墓表》
 （胡适） / 292
 跋乾隆庚辰本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抄本 / 297
 跋《四游记》本的《西游记传》 / 306
 《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》序 / 309
 《西游记》的第八十一难 / 313

卷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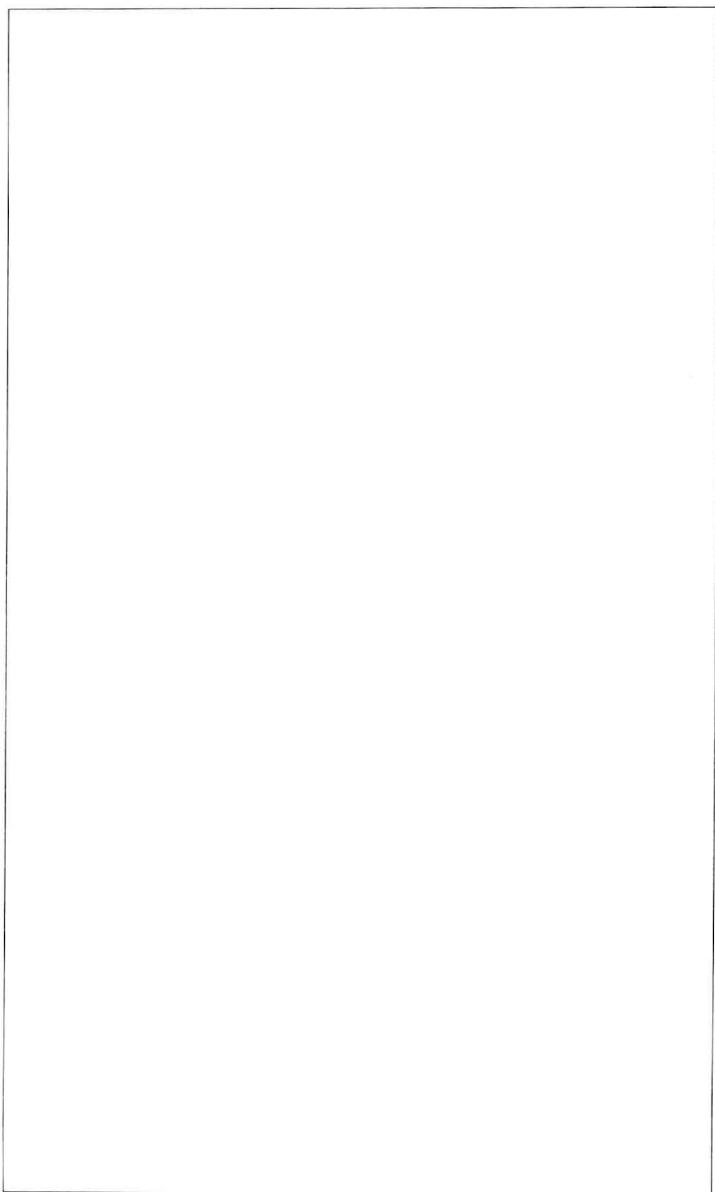
- 我们走那条路 / 323
 附录 答梁漱溟先生（胡适） / 335
 《王小航先生文存》序 / 337
 惨痛的回忆与反省 / 339
 信心与反省 / 346
 再论信心与反省 / 352
 三论信心与反省 / 358
 悲观声浪里的乐观 / 364
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/ 369
 领袖人才的来源 / 375
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（答孟心史先生） / 380
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/ 384

教育破产的救济方法还是教育 / 389
所谓“中小学文言运动” / 393
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 / 399
大众语在哪儿 / 404
试评所谓“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” / 408
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 / 413

卷五

论《春秋》答钱玄同 / 417
附录 钱先生来书 / 419
司马迁替商人辩护 / 421
谈谈《诗经》 / 426
论《诗经》答刘大白 / 435
附录 刘大白先生来书 / 437
论观象制器的学说与颉刚书 / 439
明成祖御制《佛曲》残本跋 / 443
读王小徐先生的《佛法与科学》 / 445
《参同契》的年代 / 448
《辞通》序 / 451
赵万里《校辑宋金元人词》序 / 458
《书舶庸谭》序 / 461
《人权论集》序 / 464
介绍我自己的思想（《胡适文选》自序） / 465

卷一



(一) 问题的提出。

(二) 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；他们的衣服是殷服，他们的宗教是殷礼，他们的人生观是亡国遗民的柔逊的人生观。

(三) 论儒的生活：他们的治丧相礼的职业。

(四) 论殷商民族亡国后有一个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”的预言；孔子在当时被人认为应运而生的圣者。

(五) 论孔子的大贡献：(1) 把殷商民族的部落性的儒扩大到“仁以为己任”的儒；(2) 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。

(六) 论孔子与老子的关系；论老子是正宗的儒。附论儒与墨者的关系。

→

二十多年前，章太炎先生作《国故论衡》，有《原儒》一篇，说“儒”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：

儒有三科，关“达”，“类”，“私”之名（《墨子·经上》篇说名有三种：达，类，私。如“物”是达名，“马”是类名，“舜”是私名）：达名为儒。儒者，术士也（《说文》）。太史公《儒林列传》曰，“秦之季世阮术士”，而世谓之阮儒。司马相如言“列仙之儒居山泽间，形容甚臞”。（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语。《史记》儒作传，误。）……王充《儒增》，《道虚》，《谈天》，《说日》，《是应》，举“儒书”，所称者有鲁般刻鸢，由基中杨，李广射寝石矢没羽，……黄帝骑龙，淮南王犬吠天上鸡鸣云中，日中有三足鸟，月中有兔蟾蜍。是诸名籍道、墨、刑法、阴阳、神仙之伦，旁有杂家所记，列传所录，

一谓之儒，明其皆公族。“儒”之名盖出于“需”，需者云上于天，而儒亦知天文，识旱潦。何以明之？鸟知天将雨者曰鶡（《说文》），舞旱暵者以为衣冠。鶡冠者亦曰术氏冠（《汉·五行志》注引《礼图》），又曰圜冠。庄周言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时，履句屦者知地形，缓佩玦者事至而断。（《田子方》篇文。《五行志》注引《逸周书》文同。《庄子》圜字作鶡。《续汉书·舆服志》云：“鶡冠前圜。”）明灵星舞子吁嗟以求雨者谓之儒。…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，谓其多技，故号遍施于九能，诸有术者悉赅之矣。

类名为儒。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。《天官》曰，“儒以道得民”。说曰，“儒，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”。《地官》曰，“联师儒”。说曰，“师儒，乡里教以道艺者”。此则躬备德行为师，效其材艺为儒。……私名为儒。《七略》曰，“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，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。游文于六经之中，留意于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以重其言，于道为最高”。周之衰，保氏失其守，史籀之事，商高之算，蜂门之射，范氏之御，皆不自儒者传。故孔子……自诡鄙事，言君子不多能，为当世名士显人隐讳。及《儒行》称十五儒，《七略》疏晏子以下五十二家，皆粗明德行政教之趣而已，未及六艺也。其科于《周官》为师，儒绝而师假摄其名。……

今独以传经为儒，以私名则异，以达名类名则偏。要之题号由古今异，儒犹道矣。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，于今专为师氏之守。道之名于古通为德行道艺，于今专为老聃之徒。

太炎先生这篇文章在当时真有开山之功，因为他是第一个人提出“题号由古今异”的一个历史见解，使我们明白古人用这个名词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。太炎先生的大贡献在于使我们知道“儒”字的意义经过了一种历史的变化，从一个广义的，包括一切方术之士的“儒”，后来竟缩小到那“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”的狭义的“儒”。这虽是太炎先生的创说，在大体上

是完全可以成立的。《论语》记孔子对他的弟子说：

女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

这可见当孔子的时候，“儒”的流品是很杂的，有君子的儒，也有小人的儒。向来的人多蔽于成见，不能推想这句话的涵义。若依章太炎的说法，当孔子以前已有那些广义的儒，这句话就很明白了。

但太炎先生的说法，现在看来，也还有可以修正补充之处。他的最大弱点在于那“类名”的儒（其实那术士通称的“儒”才是类名）。他在那最广义的儒之下，另立一类“六艺之人”的儒。此说的根据只有《周礼》的两条郑玄注。无论《周礼》是否可信，《周礼》本文只是一句“儒以道得民”和一句“联师儒”，这里并没有儒字的定义。郑玄注里说儒是“有六艺以教民者”，这只是一个东汉晚年的学者的说法，我们不能因此就相信古代（周初）真有那专习六艺的儒。何况《周礼》本身就很可疑呢？

太炎先生说“儒之名于古通为术士”，此说自无可疑。但他所引证都是秦汉的材料，还不曾说明这个广义的儒究竟起于什么时代，他们的来历是什么，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他们同那狭义的孔门的儒有何历史的关系，他们同春秋、战国之间的许多思想潮流又有何历史的关系。在这些问题上，我们不免都感觉不满足。

若如太炎先生的说法，广义的儒变到狭义的儒，只是因为“周之衰，保氏失其守”，故书算射御都不从儒者传授出来，而孔子也只好“自诡鄙事，言君子不多能，为当世名士显人讳”。这种说法，很难使我们满意。如果《周礼》本不可信，如果“保氏”之官本来就是一种乌托邦的制度，这种历史的解释就完全站不住了。

太炎先生又有《原道》三篇，其上篇之末有注语云：

儒家、法家皆出于道，道则非出于儒也。

若依此说，儒家不过是道家的一个分派，那么，“儒”还够不上

一个“类名”，更够不上“达名”了。若说这里的“儒”只是那狭义的私名的儒，那么，那个做儒法的共同源头的“道”和那最广义的“儒”可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？太炎先生说，“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”（《原道上》），他的证据只有一句话：

孔父受业于征藏史，韩非传其书。（《原道上》）

姑且假定这个渊源可信，我们也还要问：那位征藏史（老聃）同那广义的“儒”又有什么历史关系没有呢？

为要补充引申章先生的说法，我现今提出这篇尝试的研究。

二

“儒”的名称，最初见于《论语》孔子说的

女为君子儒，毋为小人儒。

我在上文已说过，这句话使我们明白当孔子时已有很多的儒，有君子，有小人，流品已很杂了。我们要研究这些儒是什么样的人。

我们先看看“儒”字的古义。《说文》：

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从人，需声。

术士是有方术的人；但为什么“儒”字有“柔”的意义呢？“需”字古与“妥”相通；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妥，弱也。”妥即是今“輶”字，也写作“软”字。“需”字也有柔软之意；《考工记》：“革，欲其荼白而疾瀚之，则坚；欲其柔滑而腥脂之，则需。”郑注云：“故书，需作剗。郑司农云：‘剗读为柔需之需，谓厚脂之韦革柔需。’”《考工记》又云：“厚其帑则木坚，薄其帑则需。”此两处，“需”皆与“坚”对举，需即是柔妥之妥。柔软之需，引伸又有迟缓濡滞之意。《周易》彖传：“需，须也。”《杂卦传》：“需，不进也。”《周易》“泽上于天”（☰）为夬，而“云上于天”（☷）为需；夬是已下雨了，故为决断之象，而需是密云未雨，故为迟待疑滞之象。《左传》哀六年：“需，事之下也。”又哀十四年：“需，事之贼也。”

凡从需之字，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。“懦，弱也。”“孺，

孔子也”。“懦，弩弱者也。”（皆见《说文》）《孟子》有“是何濡滞也”。凡从奐之字，皆有弱义。“奐，弱也。”（《说文》）段玉裁说奐即是懦字。稻之软而黏者为“梗”，即今糯米的糯字。《广雅·释诂》：“媆，弱也。”大概古时“需”与“奐”是同一个字，古音同读如哿，或如糯。朱骏声把从奐之字归入“乾”韵，从“需”之字归入“需”韵，似是后起的区别。

“儒”字从需而训柔，似非无故。《墨子·公孟》篇说：

公孟子戴章甫，搢笏，儒服而以见子墨子。

又说：

公孟子曰，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

又《非儒》篇说：

儒者曰，君子必古言服，然后仁。

《荀子·儒效》篇说：

逢衣浅带（《韩诗外传》作“博带”），解果其冠，……是俗儒者也。

大概最古的儒，有特别的衣冠，其制度出于古代（说详下），而其形式——逢衣，博带，高冠，搢笏——表出一种文弱迂缓的神气，故有“儒”之名。

所以“儒”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，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。

从古书所记的儒的衣冠上，我们又可以推测到儒的历史的来历。《墨子》书中说当时的“儒”自称他们的衣冠为“古服”。周时所谓“古”，当然是指那被征服的殷朝了。试以“章甫之冠”证之。《士冠礼记》云：

章甫，殷道也。

《礼记·儒行》篇记孔子对鲁哀公说：

丘少居鲁，衣逢掖之衣；长居宋，冠章甫之冠。丘闻之也：君子之学也博，其服也乡。丘不知儒服。

孔子的祖先是宋人，是殷王室的后裔，所以他临死时还自称为

“殷人”（见《檀弓》）。他生在鲁国，生于殷人的家庭，长大时还回到他的故国去住过一个时期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不记他早年居宋的事。但《儒行》篇所说无作伪之动机，似可信）。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，他懂得当时所谓“儒服”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。儒服只是殷服，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“乡”服，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。

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：最初的儒都是殷人，都是殷的遗民，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，习行殷的古礼。这是儒的第二个古义。

我们必须明白，殷商的文化的中心虽在今之河南，——周之宋卫（卫即殷字，古读殷如衣，郭韦古音皆如衣，即殷字）——而东部的齐鲁皆是殷文化所被，殷民族所居。《左传》（《晏子春秋》外篇同）昭公二十年，晏婴对齐侯说：“昔爽鸠氏始居此地，季荊因之，有逢伯陵因之，蒲姑氏因之。而后太公因之。”依《汉书·地理志》及杜预《左传注》，有逢伯陵是殷初诸侯，蒲姑氏（《汉书》作薄姑氏）是殷周之间的诸侯。鲁也是殷人旧地。《左传》昭公九年，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：“……及武王克商，蒲姑、商奄，吾东土也。”孔颖达《正义》引服虔曰：“蒲姑，齐也；商奄，鲁也。”又定公四年，卫侯使祝佗私于苌弘曰：“……昔武王克商，成王定之。…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（大弓名），殷民六族——条氏，徐氏，萧氏，索氏，长勺氏，尾勺氏，——使帅其宗氏，辑其分族，将其类丑（丑，众也），以法则周公，用即命于周；是使之职事于鲁，以昭周公之明德；分之土田陪敦，祝宗卜史，备物典策，官司彝器，因商奄之民，命以伯禽，而封于少皞之虚。”这可见鲁的地是商奄旧地，而又有新徙来的殷民六族。所以鲁有许多段人遗俗，如“毫社”之祀，屡见于《春秋》。傅斯年先生前几年作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（附录）一文，证明鲁“为殷遗民之国”。他说：

《春秋》及《左传》有所谓“毫社”者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“毫社”屡见于《春秋经》。以那样一个简略的

二百四十年间之“断烂朝报”，所记皆是戎祀会盟之大事，而毫社独占一位置，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。且《春秋》记“毫社（《公羊》作“蒲社”）灾”在哀公四年，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（姑据《通鉴外纪》），……毫社犹有作用，是甚可注意之事实。且《左传》所记毫社，有两事尤关重要。哀七年，“以邾子益来，献于毫社”。……邾于殷为东夷，此等献俘，当与宋襄公“用鄫子于次睢之社，欲以属东夷”一样，周人谄殷鬼而已。又定六年，“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，盟国人于毫社”。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：鲁之统治者是周人，而鲁之国民是殷人。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！

傅先生此论，我认为是最有见地的论断。

从周初到春秋时代，都是殷文化与周文化对峙而没有完全同化的时代。最初是殷民族仇视那新平定殷朝的西来民族，所以有武庚的事件，在那事件之中，东部的薄姑与商奄都加入合作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：

齐地，……汤时有逢公柏陵，殷末有薄姑氏，皆为诸侯，国此地。至周成王时，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，成王灭之，以封师尚父，是为太公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也说：“东伐淮夷，践奄，迁其君薄姑。”《书序》云：“成王既践奄，将迁其君于薄姑。周公告召公，作《召南·薄姑》。”但皆无灭蒲姑以封太公的事）。

《史记》的《周本纪》与《齐太公世家》都说太公封于齐是武王时的事。《汉书》明白的抛弃那种旧说，另说太公封齐是在成王时四国乱平之后。现在看来，《汉书》所说，似近于事实。不但太公封齐在四国乱后；伯禽封鲁也应该在周公东征四国之后。“四国”之说，向来不一致：《诗毛传》以管，蔡，商，奄为四国；孔颖达《左传正义》说杜注的“四国”为管，蔡，禄父（武庚），商奄。《尚书·多方》开端即云：

惟五月丁亥，王来自奄，至于宗周。周公曰：“王若曰：猷告尔四国多方：惟尔殷侯尹民，……”